

文士、将军、皇帝、佛教徒 ——梁武帝萧衍的社会角色及文学人格新说

李中华, 杨晓东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李中华(1944), 男, 湖北随州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杨晓东(1980), 男, 河南舞阳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

[摘要] 南朝萧衍曾是“竟陵八友”之一。在齐末的社会动荡中, 他统率军队, 开创了新王朝。登上皇帝宝座后, 他是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 文治武功俱有可观。晚年他又是一个痴迷的佛教徒, 曾经多次舍身同泰寺, 最后在侯景之乱中悲惨地死去。萧衍的一生, 经历了由文士、将军、皇帝、佛教徒的社会角色转换, 这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萧衍; 皇帝; 佛教徒; 文学人格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2-0187-10

在中古文坛上, 梁武帝萧衍一直引人瞩目。《梁书·文学传序》曰:“高祖聪明文思, 光宅区宇。旁求儒雅, 诏采异人。文章之盛, 涣乎俱集。”^[1](第685页)《南史·梁本纪》曰: 梁武帝“制造礼乐, 敦崇儒雅, 自江左以来, 年逾二百, 文物之盛, 独美于兹”^[2](第225页)。梁武帝在位长达48年, 其间诗文创作兴盛, 作者众多, 造成了文坛的繁荣景象, 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从另一角度切入, 萧衍又是生平经历最为奇特、社会角色最为繁复的一个生命个体: 年轻时, 他是著名的“竟陵八友”之一, 是一介文士; 在齐末的征战中, 他是一个深于韬略、所向披靡的军事将领; 登上皇帝宝座后, 他是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 文治武功俱有可观; 他生命的晚年又是一个痴迷的佛教徒, 曾经多次舍身同泰寺, 最后在侯景之乱中悲惨地死去。萧衍的社会角色与文学人格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摄, 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 成为南朝文学中一道独特的景观。其中所寄寓丰富的文化信息, 尤其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这就是本文试图加以新的探讨与解说的。

萧衍(464—549), 字叔达, 南兰陵中都里人。他的父亲萧顺之是南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萧道成建立南齐王朝, 萧顺之参预佐命, 封临湘县侯, 历官南齐侍中、卫尉、领军将军、丹阳尹。在这种皇亲贵戚的家庭中, 萧衍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他“少而笃学, 洞达儒玄”^[1](第96页), 又“博学多通, 好筹略, 有文武才干”^[2](第168页)。青年时期的萧衍, 便以其博学兼有干练之才而受到当时名流的一致推崇。

萧衍20岁左右开始步入仕途。他先是担任巴陵王萧子伦的南中郎法曹行参军, 迁卫将军王俭东阁祭酒, 后来转到萧子良门下, 任司徒西阁祭酒, 从而成为“竟陵八友”中的成员。关于“竟陵八友”,

《梁书·武帝本纪》载云：

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即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

所谓“竟陵八友”,是永明年间围绕竟陵王萧子良而形成的文人集团。这一文人集团的形成大约是在永明五年以后,而随着朝廷政局的急剧变化在永明末年迅速解体。在此期间,萧衍以参军、祭酒的职务辗转于诸王幕府,实际的身分则是一介文士幕僚。同时代的文人虞羲有《敬赠萧咨议诗》曰:“相门出相,德门有德。……弱冠伊何?有典有则。淑问伊何?自南自北”,这是赞美他的美名令誉;又说“五芝秀草,八桂嘉树。……彼令兄弟,方之有裕。并列大夫,登高而赋”,这是赞美他的文采风流;又说“受言载笔,遂典群流。……申辕风雅,邹郟春秋。彝文不斲,职此之由”,这是赞美他的学识与职事所在。可以看出,永明年间——即萧衍从 20 岁到 30 岁的这段岁月中,他是以文士幕僚的身分活跃于政坛的。

从永明末年开,萧衍积极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斗争,他的文士身分因而迅速淡化。在南齐皇权争夺剧烈而诡谲的关口,萧衍本着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投靠了迅速崛起的西昌侯萧鸾。后来萧鸾执掌中枢政权,萧衍便被任命为宁朔将军、镇寿阳。萧鸾登上帝位后,又任命萧衍为冠军将军、司州刺史。建武四年(497),萧衍升任辅国将军、监雍州府事,不久便被正式授以辅国将军、雍州刺史,驻守军事重镇襄阳。

萧衍成为一方诸侯,不久朝廷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在位四年的明帝萧鸾突然去世。萧鸾本来是以阴谋暗算与铁腕手段掌控朝局的专制君主,他的去世使得朝廷立即陷于动乱与危机之中。即位的萧宝卷(史称“东昏侯”)性情乖张,嬉游无度,又任意诛杀朝臣,使得“大臣人人莫能自保”。朝中又有所谓“六贵”“八要”,各擅威势,相互厮杀,政局因而一片混乱。永元二年 11 月,萧衍起兵襄阳,率军杀向建康。永元三年(501)12 月,萧宝卷被杀。次年四月,萧衍正式称帝,改建国号曰梁,时年 38 岁。

从 30 岁到 38 岁,萧衍是一位统帅着千军万马、威镇一方、叱咤风云、有意窥伺皇帝宝座的军事将领。天监元年(502),萧衍登基开创新王朝,他的身分立即转变为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在南朝历史上,萧衍是在位最久的君王。他自 38 岁称帝,直到 86 岁去世,共占据帝位长达 48 年。而前朝南齐七帝总共在位 24 年,只是萧衍一人在位时间的一半。长期的皇权稳定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与经济破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出现了被史家称为“天监之治”的太平景象。同时,它又强化了萧衍浓重的皇权意识。由于深层体制的原因,梁武帝后期宗王贵族奢靡腐化,法制极度紊乱,世风萎靡不振,社会危机日益深重。而作为封建帝王的萧衍,又愈来愈痴迷上了佛教。

萧衍的思想背景,本来是儒道释三家并用、杂糅互补的格局。他曾经大力倡导儒家的教义,主张立国应以儒教为首。天监七年,朝廷降诏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今声训所渐,戎夏同风。宜大启庠教,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1](第 661-662 页)史书还记载说:“武帝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宴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2](第 1730 页)萧衍对于道教采取的则是实用主义的态度。汤用彤推测萧衍“原系道教世家”^[3](第 341 页),所以他先就接受了道教信仰。他与著名道士陶弘景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史书载录,梁武帝即位后“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1](第 743 页),“时人谓为山中宰相”^[2](第 1899 页)。天监中,陶弘景将炼成的飞丹献给萧衍,萧衍“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每得其书,烧香虔受”^[2](第 1899 页)。萧衍受佛教思想的浸染时间较晚,大致在他 50 岁以后才开始形成强烈的佛教信仰。他在《述三教诗》中历述自己信仰的转变,写道:“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孝义连方册,仁恕满丹青”,“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妙术镂金版,真言隐上清”,“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示教唯平等,至理归无生。”所以从信仰上说,萧衍是先崇儒,次奉道,后信佛,最终成为一个著名的佛教徒。

天监末年至普通、大通之际,萧衍的人生态度与思维趋向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即由崇信三教到专心奉佛。据史书记载:天监十八年(519)“夏四月丁巳,帝(指萧衍)于无碍殿受佛戒”^[2](第 197 页)。这是萧衍后期生命信仰的重要转折点,表明他从此成为一个佛教徒,他开始自称“菩萨戒弟子皇帝”。史书说梁武帝“晚乃溺信佛道,……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

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2](第223页)又记载此后梁武帝在佛寺设立大法会、演讲佛经,共计达16次之多。他将虔诚的佛教信仰,坚持到自己生命的终结。

由南齐政坛上的一个文士幕僚、到镇守一方的军事将领、再到梁朝开国皇帝、最后皈依佛门而终,这就是萧衍一生走过的生命轨迹。

二

萧衍一生中,其社会身分发生了几次转换。这涉及到若干基本的历史事实,厘清这些事实,对于理解他的人格表现至为重要。以下对此加以辨析。

(一) 萧衍与萧子良、萧鸾的关系

永明末年,南齐政坛爆发了激烈的皇权纷争。在这一涉及最高权力的争夺中,萧衍背离了他一度追随的竟陵王萧子良,站到西昌侯萧鸾一边。这不仅在萧衍仕途上是极为关键的一步,也是他人格转型的重要契机。萧衍曾任竟陵王司徒萧子良的“西阁祭酒”,又是“竟陵八友”的成员,他在情感心态上对于萧子良的依附与期待,应是明确无疑义的。然而在关键的时刻,萧衍的立场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据《南史·梁本纪》记载:

齐武帝不豫,竟陵王子良以帝(指萧衍)及兄懿、王融、刘绘、王思远、顾勗之、范云等为帐内军主。(王)融欲因帝(指齐武帝)晏驾立子良,帝(指萧衍)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融才非负图,视其败也。”范云曰:“忧国家者,惟有王中书。”帝(指萧衍)曰:“忧国欲为周召,欲为竖刁邪?”

周召指西周时期的辅佐大臣周公、召公,竖刁则是春秋时齐国的一名佞臣。史载齐桓公卒,竖刁与易牙争权,祸乱齐国。这里,萧衍的态度十分明确,即反对以非常的手段拥立萧子良为帝。其内在的原因,《南史》说是因为萧衍之父萧顺之的死与齐武帝有关,所以萧衍不支持齐武帝的子孙继承皇位,转而支持萧鸾。这种复仇的心态,如今已经难以确认,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潜在的力量对比,以及萧衍心中对于未来成败祸福的判断。萧衍有着敏锐的政治观察与判断力。他在内心早已认定:萧鸾富于谋略,又执掌着实权,书生气十足的萧子良既非其对手,王融辈亦无雄才大略,所以胜败大局已定。

在这场皇权争夺中,萧衍与萧鸾结成了同盟。萧鸾视萧衍为心腹,经常与之密商篡夺大计。《南史·梁本纪》记载:

齐明……每与帝(指萧衍)谋。时齐明将追随王,恐不从。又以王敬则在会稽,恐为变,以问帝。帝(指萧衍)曰:“随王虽有美名,其实庸劣。既无智谋之士,爪牙惟仗司马垣历生、武陵太守卞白龙耳。此并惟利是与,若啗以显职,无不载驰,随王止须折简耳。敬则志安江东,穷其富贵,宜选美女以娱其心。”齐明曰:“亦吾意也。”

萧衍为萧鸾出谋划策,二人的意见竟然完全一致。萧衍一计既稳住了王敬则,又翦除了随王的势力。显然,萧衍是以利害为考量来决定着自己的政治归属。结果如同他的预料,萧鸾登上了帝位,萧衍则得到封爵犒赏,并且随后迅速攫取了军政大权,成为威镇一方的军事将领。

(二) 觊觎皇权,起兵襄阳

萧衍在《净业赋序》中描述他的生平志向,说自己“少爱山水,有怀丘壑,身羁俗罗,不获遂志”^[3](第2949页),似乎他对于获得世俗的最高权力从来不感兴趣。他还经常宣扬自己的隐逸之志。《金楼子·兴王》载云:永明十年萧顺之去世后,萧衍“涕泪所洒,松为变色。……因欲隐遁,太傅宣武王苦谏乃止”,这一年萧衍29岁。萧衍后来回忆当年开国登基的情景,又说“独夫既除,苍生苏息,便欲归志园林,任情草泽。……事不获已,遂膺大宝”^[4](第2950页),萧衍初登基时年38岁。天监十五年,萧衍在《手书与萧宝夤》中又说:“勿谓今日之位,是为可重。朕之视此,曾不如一芥。虽复崢峒之踪难追,汾阳之志何远!”^[5](第2979页)这一年萧衍53岁。在萧衍的笔下,他当皇帝完全是件迫不得已的行为,并且随时准备放

弃,他的理想只是作一名悠然山林之间的隐逸之士。

这是萧衍为了塑造自己的虚假人格形象,而著意编造出的谎言。

年轻的萧衍有着雄才大略,用心深邃而远大。“竟陵八友”之一的王融早就洞察了他的政治才干与野心,曾评价说:“宰制天下,必在此人!”^[1](第2页)又据史书记载:建武末年,萧衍曾与门下亲信张弘策谈及朝廷时事,萧衍预言:“明年都邑有乱,死人过于乱麻,齐之历数自此亡矣。梁、楚、汉当有英雄兴。”张弘策问:“英雄今何在?为已富贵,为在草茅?”萧衍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仆?”张弘策马上表态说:“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请定君臣之分!”萧衍笑着叮嘱:“且勿多言!”^[1](第205—206页)这一段对话将萧衍觊觎皇权的政治野心,揭露得淋漓尽致。依据他们交谈的内容分析,这是在建武四年(497)的深秋,萧衍当时的职事是“太子中庶子、领羽林监,顷之出镇石头”^[1](第2页),其时他才33岁。可知对于最高权力的向往与追求,是萧衍既定而不竭的政治动力。

萧衍就任辅国将军、雍州刺史的当月,明帝萧鸾去世。萧衍敏锐感觉到机会来临,他立即着手准备夺取最高权力。一是人事上的策划:他先派张弘策前往郢州,劝说长兄萧懿早定宏图,在两次劝说无效的情势下,萧衍便作出了自己独立的安排。他先将同父异母兄弟萧伟、萧憺接到襄阳(二人后来分别为萧衍镇守襄阳、荆州),为举兵起事作好了初步的准备。二是物资上,萧衍下令“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1](第4页)。当萧衍率军离开襄阳时,对其留守的八弟萧伟说:“天下一家,乃当相见!”^[1](第4页)萧衍夺取天下、开创新朝的一腔心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在萧衍消灭了全部政治敌手、垄断朝纲以后,他便开始一再地政治作秀,先是辞相国、辞梁王,然后又抗表辞让帝位,让群臣多次联名上表固请,藉此欺骗、并收买天下人心。在即位诏书中,他仍不忘假惺惺地说“群公卿士,咸致厥诚”、“皇乾降命,难以谦拒”,又说“自惟匪德,辞不获许。仰迫上玄之眷,俯惟亿兆之心,宸极不可久旷,民神不可乏主”^[2](第34页),仿佛登上帝位对他是件违背心愿、迫不得已的事情。这充分展现了他的政治品质与谋略。

(三)萧衍佞佛,四次舍身同泰寺

萧衍一生曾经四次舍身同泰寺。所谓“舍身”,即为佛法而献身,亦即出离俗界、皈依佛门之意。据史书记载:

大通元年(527)“三月辛未,舆驾幸同泰寺舍身”^[1](第71页)。

中大通元年(529)秋九月,“癸巳,舆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因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1](第73页)。

中大同元年(546)三月,“庚戌,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仍施身。夏四月丙戌,皇太子以下奉赎”^[1](第218页)。

太清元年(547)“三月庚子,高祖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舍身。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1](第92页)。

君王置江山社稷不顾而舍身佛门,历史上极为罕见。一而再、再而三地舍身,更是绝无仅有。萧衍舍身佛门的原因比较复杂。有人认为,萧衍皈依佛门、多次舍身是出于内心的愧疚之情,是对于往日行为的忏悔。王夫之曾分析说:萧衍皈依佛门,是从政治伦理善恶的考量所作出的理性抉择,是对当年弑君篡国内心深处的忏悔^[5](第489页)。当代学者赞同其说,亦云:“历来许多帝王和军阀尽管杀人如麻,却在晚年佞佛,都和‘果报’说有关,他们想用‘忏悔’来免去过去的罪孽。在梁武帝尤其是这样。”^[6](第84页)然而实际上,萧衍从来不认为自己开创新朝、登基作皇帝是一种罪孽,他强调的是“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1](第33页),强调的是“时会云雷,拨乱反正,遂膺四海”^[4](第2948页),强调的是“扫定独夫,为天下除患”^[4](第2950页)。相对而言,萧衍对于政敌比较宽大,诛杀也并不很多。在南朝那种篡乱连绵、兴亡相续的政治生态中,萧衍是否会因为开创新朝而产生负罪感,是很值得怀疑的。

分析起来,萧衍舍身奉佛的原因比较复杂。从时间看,萧衍前二次舍身与后二次舍身之间相距近20年,应该分别而论。以我们的推测,萧衍前二次是出于孝道,为父母双亲而舍身。萧衍《孝思赋序》中

写道:“今日为天下主,……亦复不能得朝夕侍食,唯有朔望亲奉馈奠,虽复荐珍羞,而无所瞻仰。内心崩溃,如焚如灼。”《续高僧传·宝唱传》说,萧衍为死去的父母建寺追福,“频代二皇舍身为僧给使”^[7](第27页)。萧衍后二次舍身时,他已经是80多岁的老翁了。其内心动因,应该是出自对皈依三宝的虔诚与痴迷。

三

不同的社会角色在萧衍身上有着相应的人格表现。由于萧衍一生的角色转换如此迅疾,其形态差异又是如此显著,所以在他的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人格变异的轨迹。

作为文士幕僚的萧衍,与竟陵八友中的其他人并无本质的不同。如果不涉及到政治利害的考量,萧衍待人还比较重视情谊。《南史》记载:他与谢朓“以文章相得”^[2](第535页),二人有诗唱和。萧衍并且十分推崇谢朓的文学才华,常对人说:“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8](第1483页)。他与范云的关系非同寻常,《南史》记载:“梁武为司徒祭酒,与(范)云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欢甚”^[2](第1418页),范云去世时,“帝为流涕,即日舆驾临殡”^[2](第1420页)。萧衍与任昉的关系显得自在随意,据载二人在竟陵王西邸时,萧衍曾对任昉说:“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因为任昉长于文笔。任昉则回答说:“我若登三事,当以卿为骑兵。”因为萧衍骑术高明。后来萧衍霸府初开,果然用任昉为记室参军,“专主文翰”^[2](第1453页)。史书又记载萧衍“在西邸,早与(萧)琛狎”^[1](第397页),又“雅爱(陆)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铭》,其文甚美”^[1](第402页)。萧衍与王融、沈约的关系中夹杂较多政治因素,在此略而不论。

永明时期的萧衍,身上有着浓重的文人气质。他虽然胸怀韬略,但是待人平易,乐于相处,与众多文士一道诗酒唱和,并无很深的城府。永明九年春,萧衍赴荆州任随王萧子隆咨议参军,王融、任昉、宗夬、萧琛等均有诗赠别,可见一斑。

随着永明时代的结束,萧衍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由一介彬彬文士迅速转变为雄踞一方的大员,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将军。作为军事将领的萧衍,他表现出新的能力与品格,即对于政治形势敏锐的判断力、深于谋略、敢于决断的意志力以及不畏冒险的精神。建武二年救援司州战斗中,当时任冠军将军、军主、率领偏师的萧衍主动请战,率众连夜赶赴贤首山,终于将敌军击退。在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之后,为了不至于引起齐明帝的猜忌,他又改行韬晦之计,麻痹萧鸾对自己的警惕心。史书记载:“齐明性猜忌,帝(指萧衍)避时嫌,解遣部曲,常乘折角小牛车。齐明每称帝清俭,勸励朝臣”^[2](第170页)。在起兵襄阳之后,他善于借用各种力量,尽量缩小打击目标。他曾经用两封信函行离间计,破刘山阳前来进攻的大军,使荆州守将萧颖胄不得不归附自己,他对人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今日是也!”^[2](第172页)而当萧颖胄建议“请教于魏,与北连合,犹为上策”时,他坚决表示反对说:“丈夫举动,言静天步,……岂容北面请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贻我丑声。此之下计,何谓上策?”^[1](第10页)在角逐最高权力的战斗中,萧衍的气魄、谋略、胆识皆非同寻常。

萧衍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的身分转变为君王。登上帝位之初,他显然想当个好皇帝。天监元年,萧衍曾对范云说:“朕之今日,所谓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马!”范云对曰:“亦愿陛下日慎一日。”^[1](第231页)他对于国事兢兢业业,不敢稍有懈怠,屡次见诸言表。他曾下诏废止前朝的一切酷刑淫役,多次蠲免贫民的赋税,关怀流离失所的百姓,又将后宫中的宫女乐伎“一皆放遣”^[1](第35页);为了通达下情、广开言路,他特别降诏在“公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1](第37页),容许四民百姓直接向君王上书;他还不时派员巡视四方,要求“政有不利于民者,所在具条以闻”^[1](第55页)。天监三年六月诏书中云:“总总九州,远近民庶,或川路幽遐,或贫羸老疾,怀冤抱理,莫由自申。……念此于怀,中夜太息。”^[1](第40页)天监六年春正月又降诏云:“夫有天下者,义非为己。凶荒、疾疠、兵革、水火,有一于此,责归元首。今祝史请祷,继诸不善,以朕身当之,永使灾害不及万姓,俾兹下民稍蒙宁息。”^[1](第44页)这些都表明,萧衍最初的愿望是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他想作一个青史留名的圣明之君。

但是,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实际的社会状况却是另一回事。不管萧衍怎么说,他都是在封建专制主

义的体制框架内活动的。因为缺乏体制的更替,他面对的是宗王政治、门阀势力以及整个上层的萎靡不振,他无法避免体制内的惰性与腐败。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历史上罕见的现象:一个向往清明政治、持身严谨、自奉廉洁、并且不乏谋略的开国皇帝将自己的国家搞得一团糟,并直接使它坠入了巨大动乱与破坏的深渊之中。

作为佛教徒的萧衍,其人格表现可作两面观。一方面,他晚年不贪图享乐,严格遵守戒律,平时生活自奉十分俭朴。据历史记载,他从天监十六年起便断酒肉,又“五十外便断房室”^[1](第97页)。萧衍平时,“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食而已。……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不饮酒,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1](第97页)。天监十二年又降诏各地掩埋无名尸骸,“庶夜哭之魂斯慰,沾霜之骨有归”^[1](第53页)。普通二年,又在京城设“孤独园”收养孤儿及孤独老人^[1](第64页),并要求各地照此办理。他还经常蠲免民间的租税,大赦天下。这表现他确实受到佛教观念宅心仁厚、慈悲为怀的影响。另一方面,佛教转移了他对于现实朝政的关注,消磨了他的经世之志,将他早期展现的军事韬略化解于无形。他在天监十六年降敕“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祈告天地宗庙,以去杀之理,欲被之含识”^[2](第196页)。他共写了四篇《断酒肉文》,不过是说食酒肉“断大慈种,……远离佛果”之理。他在《手书与萧宝夤》中还说:“朕于昆虫,犹不忍杀,亦何急争无用之地,战苍生之命也?”^[4](第2979页)他放弃了作为君王应当担当的社会职责,从而导致天下大乱。

在萧衍身上,不同类型的人格转换是复杂的,其中后起人格对于原本人格并非简单的否定与取代,而是变易中有继承、调整中有渗透。而在上述各类人格表现中,对于文学创作的喜爱、文人气质的保存几乎贯穿萧衍成年后的整个生命历程。

四

如前所述,永明年代的萧衍,是“竟陵八友”中的一员。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创作显得清丽自然,富有情感。永明九年作《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云:

问我去何节?光风正悠悠。
兰花时未晏,举袂徒离忧。
缓客承别酒,鸣琴和好仇。
清宵一已曙,邈尔泛长洲。
眷言无歇绪,深情附还流。

这是一首抒发离情别绪的诗。诗题中的任殿中即任昉,宗记室即宗夬,王中书即王融。任昉《别萧咨议诗》云“离烛有穷辉,别念无终绪。……浮云难嗣音,徘徊怅谁与”,宗夬《别萧咨议诗》云“别酒正参差,乖情将陆离。……眷言终何託,心寄方在斯”,王融《萧咨议西上夜集诗》云“徘徊将何爱,惜别在河梁。衿袖三春隔,江山千里长”。他们的诗中流露出离别之思,表达了相互依恋的友谊。萧衍的答诗首四句则写时序物色,中四句写夜集别宴,末二句写离别之后思绪不尽,唯有寄诸流水。诗中的离情舒缓悠长,又是真诚自然的。

萧衍又有《直石头诗》,诗中描写石头城一带的形势气象曰:

郁盘地势远,参差百雉壮。
翠壁绛霄际,丹楼青霞上。
夕池出濠渚,朝云生叠嶂。

这几句诗写景气势雄浑,流动自如。翠壁、绛霄、丹楼、青霞,当句有对,更显出色彩明丽。谢朓有《和萧中庶直石头》诗,排比典故,显得板滞难读,反不及这几句的自然与开朗。

萧衍一生还写作了许多乐府诗。他的早期乐府诗意境温润,情趣婉约,有优雅娴丽之美。如以下的作品:

绿树始摇芳，芳生非一叶。
 一叶度春风，芳华自相接。
 杂色乱参差，众花纷重叠。
 重叠不可思，思此谁能惬？

《芳树》

谁言生离久，适意与君别。
 衣上芳犹在，握里书未灭。
 腰中双绮带，梦为同心结。
 常恐所思露，瑶华未忍折。

《有所思》

又如《古意二首》：

飞鸟起离离，惊散忽差池。
 嗷嘈绕树上，翩翩集寒枝。
 既悲征役久，偏伤垆上儿。
 寄言闺中妾，此心谁能知？
 不见松萝上，叶落根不移。

当春有一草，绿花复垂枝。
 云是忘忧物，生在北堂陲。
 飞飞双蛱蝶，低低两差池。
 差池低复起，此芳性不移。
 飞蝶双复只，此心人莫知。

沈约、王融、范云皆有《古意》诗，亦属乐府体制。它们可能是同时或先后所作，由此可以大体感知萧衍早期五言乐府诗清丽婉约的艺术风貌。许学夷《诗源辩体》评曰：“梁武帝乐府五言，情虽丽而未甚靡。齐梁间乐府，惟武帝稍为有致。”又曰：“永明以后，梁武取调，范云取气。”^[12]（第125页）大体而言，萧衍五言诗具有情调与意境，是可以确定的。

萧衍还有十二章题为《赠逸民诗》的四言作品，也写得很有特色。如下列二章：

仲节犹嫩，春色始娇。湛露未晞，轻云已消。
 绿竹猗猗，红桃夭夭。香气四起，英蕊六摇。
 蜂开采花，雀戏新条。 （其九）

风光绿野，日照青丘。孺鸟初飞，新泉始流。
 乘舆携手，连步同游。采芳中阿，折华道周。
 任情止息，随意去留。 （其十）

诗所赠的“逸民”，可能是什么人。何点是当时著名的隐逸之士，萧衍在征召诏书中说他“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脱落形骸，栖志宵冥”^[13]（第2955页）。他又是萧衍登基称帝前的朋友，《赠逸民诗》（其八）中“缱绻故旧，绸缪宿昔”便是证明。上引九、十两章描绘了山中清幽的自然风物，回忆了初春时节二人携手同游的往事。诗中写景清新而明丽，叙事从容而自在，颇有嵇康《赠秀才入军》四言诗的风调。其十一章分别以“木有异心”、“鸟有殊音”、“鱼有浮沉”托意，说明人生目标与价值取向各不相同，并从中寄寓了深沉的怀念之思。即使是在整个的中国四言诗史上，这几首作品写景抒怀之明丽婉约、意态之潇洒自如，也不失为上乘佳作。

萧衍的七言乐府歌行，在诗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著名的《河中之水歌》与《东飞伯劳歌》，将句句用

韵的柏梁体转变为隔句用韵的七言歌行,对于唐代七言歌行体的形成与完善,有着启迪的意义。明代胡应麟《诗数》论七言诗的发展,有云:“(南朝)七言歌行,梁武尤胜。《河中之水》、《东飞伯劳》,皆寓古调于纤词,晋后无能及者,……并唐体之祖也。”^[9](第46页)

萧衍杂言体的《江南弄》七首,在乐府诗歌史上的价值同样不容忽视。据《古今乐录》曰:“梁天监十一年,武帝改西曲,制……《江南弄》七曲:一曰《江南弄》,二曰《龙笛曲》,三曰《采莲曲》,四曰《凤笛曲》,五曰《采菱曲》,六曰《游女曲》,七曰《朝云曲》。”^[10](第726页)这些乐曲有唱有和,有乐器伴奏。有人认为词乃是“六代乐府之流变”,持此说者多举萧衍《江南弄》为例证。试看以下二首:

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耀绿垂轻阴,连手躡蹀舞春心。
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蹰。

《江南弄》

游戏五湖采莲归,发花田叶芳袭衣,为君艳歌世所希。
世所希,有如玉。江南弄,采莲曲。

《采莲曲》

这些作品与唐宋词中小令的体式已经非常接近。它们句式长短参差,已有定式,具有了抒情歌曲的性质,因之将它们视为词的滥觞亦无不可。

萧衍具有广泛的文学才能。在众多的诗歌体裁与领域中,他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还善于文章写作。他早期的公告檄文骈散兼行,贯通以内在充沛的气势,有着震撼人心、分化敌垒的作用。萧衍有些小品文也写得轻松活泼,平易自然。如《手诏与何点》:

昔因多暇,得访逸轨。坐修竹,临清池,忘今语古,何其乐也!暂别丘园,十有四载。人事艰阻,亦何可言?自应运在天,每思相见。密迹物色,劳甚山阿。严光排九重,践九等,谈天人,叙故旧,有所不臣,何伤于高?文先以皮弁谒子桓,伯况以穀綃见文叔,求之往策,不无前例。今赐卿鹿皮巾等,后数日,望能入也。

“坐修竹”寥寥十余字,生动再现了当年两人相会交谈的场面。文中还举出东汉高隐之士严光见光武帝等事,希望何点前来与自己相见。作为帝王诏书,文字如此平易,写景写情,如话家常,极为罕见。

又据历史记载:尚书右丞江子四给朝廷上奏章,极言政治得失。萧衍乃降诏曰:

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所钟过,不能自觉。江子四等封事如上,尚书可时加检括,于民有蠹患者,便即勒停。宜速详启,勿致淹缓。^[11](第80页)

诏文简明扼要,引用古语贴切,用“朕所钟过,不能自觉”八字自指,直截了当,不加掩饰。整个诏书虽然不足100字,却把问题说得十分明确。

萧衍后期的诗文诏告排比俚藻,铺陈故实,增添了陈腐的说教,同时自我标榜夸饰的倾向变得日益严重。相比他前期绮靡而又不失健朗的文风,无疑是一种倒退。

五

以上分别就萧衍一生中所承当的多种社会角色、所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相应的人格转变进行了陈述,并区别文体介绍了萧衍的文学创作及成绩。以下所要讨论的是:萧衍的社会角色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试图从历史、人性与文学精神的层面对此作出新的探索与评价。

萧衍的人格表现有着十分复杂的内涵,其中包括政治人格、宗教人格、文学人格等不同的层面。从政治上说,萧衍始则参与朝政、统率军队、指挥战争、争夺权力,后来开创新王朝、登基称帝、治理国家,他的政治品质、社会伦理、治国谋略影响到他的人生表现。从宗教上说,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宗教情怀、对于佛法义理的领悟以及生命所能实现的境界,直接地熏染了他的人生气象。从文学上说,他的文学理念、情感、想象能力及空间陶冶了他的文人气质,影响着他的生命形态。对于萧衍来说,还有更为

重要的是,他能否将上述不同内容、不同性质、不同指向的人格表现和谐地统一起来,使之结合为一个精神超越、境界阔大、气象高华的生命个体。在这方面,应该说萧衍是并不成功的。

萧衍缺乏对自己历史身分的准确定位与把握。他最重要的身分应是君王,因为这一社会角色与国家的兴衰、社会的治乱、民众的福祉有着最广泛、最直接的联系。作为封建君王,萧衍首先应该处理好与国家安危、朝廷治乱相关的事务,管理好他的国家。可是,如果不看朝廷诏书中那些空洞的宣言,后期的萧梁政局可以说是弊端百出。宗王恣肆无端,官员奢侈享乐,社会危机深重,而萧衍本人则喜爱阿谀、拒绝批评。中大同元年(546),散骑常侍、尚书左丞贺琛上书朝廷,尖锐地指出时政的弊端:其一是民众逃亡,户口空虚;其二是官吏贪婪,奢侈成风;其三是吏治刻薄,诡竞求进;其四是官员繁多,征求无已,民力凋敝。应该说,贺琛对于朝政弊病的揭示与分析并非危言耸听。然而萧衍却因此勃然大怒,将贺琛招来当面一一驳斥^[1](第546页)。所以《魏书》上说,萧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11](第2184页)。

《南史·梁本纪》感叹说:“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12](第226页)为什么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又亲手让它丧失了?这是由于在开创新朝之后,萧衍便把江山社稷当作了自己一姓的私产。他在坐稳皇帝的宝座之后,又利用皇权尽量满足自己对于荣名的渴望,他想同时兼任人间皇帝、宗教领袖、学界导师、文坛泰斗于一身。他的众多著述、演讲及相关作为,几乎都是出于这一深层的欲念。唐代魏征评说他“慕名好事,崇尚浮华……非弘道以利物,唯饰智以惊愚”^[13](第150-151页),算是点出了问题的要害。

萧衍文学上的表现虽然引人注目,但是从思想意义上说,他够不上一流作家。他的作品多为代言体,其中模拟男女相思及游仙的诗作,基本上看不到诗人自己的形象。即便是描写个人经历的诗作,其中的抒情也十分浮泛,缺乏刚健的风骨与超越世俗的精神品质。萧衍本人所经历的社会事态:如南齐末年,政治昏暗,国势安危,民众疾苦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实,在萧衍的诗歌中毫无反映。与同为君王而前于他的曹操、后于他的李煜相比,其间的文学境界差距巨大。曹操的诗歌中不乏个人慷慨之志与悲壮之怀,即使后人所评说的“霸气”,那也是曹操所特有、真实无欺的。南唐后主李煜那种天真的“赤子之心”,反映的是他生命中的本真,他的悲惋的柔情是他特殊的生命表达,而不是出于摹拟。然而在萧衍作品中,他的自我形象是非常模糊、缺乏个性的,同时也是有违历史真实的。

作为佛教徒的萧衍,在佛教义理与文学思维的结合上也是失败的。他的《十喻诗五首》、《和太子忏悔诗》只是将佛教义理敷衍成韵文的形式,毫无诗的意趣。他的宣扬佛法的文章缺乏形象感,文字枯涩,不忍卒读。与同为佛教徒而前于他的谢灵运、后于他的王维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谢灵运的山水诗尽管夹杂着佛理玄言的点缀,但是其中物色的描写形象生动鲜明。王维的作品则将佛法义理与诗的意境糅为一体,二者相互融摄,开拓出一个诗与禅共生的境界。而在这方面,萧衍除了将佛教的义理与词语移植入诗文,此外几乎无所作为。

萧衍的悲剧是深刻的:年轻时他不乏文采,又有军政韬略,称帝后勤于政事,著述繁多。个人持身十分廉洁俭约,几至无可挑剔。然而他在政治上使朝廷陷于严重的动乱,使百姓遭遇巨大的苦难,终于亡国。尽管他具有文学的才华,然而成就有限,乃至被后世当成齐梁不良文风的代表人物。追究造成这一悲剧的深层原因,是由于他在体制内的因循、文化上的保守,视野逼仄,局面狭小。在身分定位上,他主次不分,本末倒置,歧路亡羊,令人感叹!萧衍的悲剧不仅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与文学上的,其中多方面的寓意值得深入发掘。

[参 考 文 献]

- [1] 姚思廉. 梁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 [2] 李延寿. 南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严可均辑. 北京:中华书局,1958.
- [5] 王夫之. 读通鉴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6] 曹道衡. 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M]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7] 任继愈. 中国佛教史: 第 3 卷[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 [8] 李 . 太平广记[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9] 胡应麟. 诗薮[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10] 郭茂倩. 乐府诗集[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1] 魏 收. 魏书[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2] 许学夷. 诗源辩体[M]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责任编辑 何坤翁)

Emperor, Buddhist, Literature Personality

LI Zhonghua, YANG Xiaod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LI Zhonghua (1944),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YANG Xiaodong (1980), male,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literature history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bstract: XIAO Yan, once being the member of “eight friends of Jing Ling King” took command of the armies and brought a new dynasty during the social unrest at the end of Qi Dynasty. As the emperor who reigned the longest among all emperors in Southern Dynasties, he made remarkable administrative and military achievements after his throne. However, in his last years, XIAO indulged himself in buddhism and he even wanted to be the buddhist in Tong Tai Temple. For his whole life, XIAO experienced three phases includeing literator, general and buddhist emperor. And his literature creation benefited a lot from his character shift.

Key words: XIAO Yan; emperor; buddhist literature; personality